

拉丁美洲原住民政治参与活动：潜力发掘不足

作者：Anaïd Flesken

2014年9月，联合国召开世界原住民大会，讨论实现原住民权益的成功事例及其前景。然而在拉丁美洲，原住民一如既往被边缘化，原住民及国家各种行动力量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

解析

虽然过去数十年里，拉丁美洲已经承认了原住民的权利，然而原住民仍然受到经济、政治及社会方面的歧视。原住民及其组织加大政治参与活动力度，反对贫困以及社会歧视。

- 边缘化、资源开采、基础设施项目，不仅对环境及原住民的生活基础带来了威胁，而且也激发了原住民与国家性及非国家性行动力量之间的矛盾。
- 拉丁美洲原住民之间的差异极大，不同族群之间的界限模糊，而自我身份认同，尤为主观。因此，在这些身份认同框架下进行政治参与活动，重要的不是共同的归属感，而是他们共同面临的问题。
- 虽然存在着几个特例现象，政治参与活动常常局限于地方层面。资源匮乏、缺乏施加政治影响的机会、原住民机构之间缺乏共识，上述种种，都阻止人们组织全国性的普遍政治参与活动。

关键词：拉丁美洲、原住民、边缘化、公民权利、社会/政治运动

拉丁美洲的原住民政治参与活动

2004年联合国宣布启动“世界原住民族国际十年”，其目的是减少歧视、提高原住民参与度及发展，至2014、2015年之交，第二个“世界原住民族国际十年”已经结束了。2014年9月，联合国召开世界原住民大会。会议上，联合国的成员国强调支持实现原住民权利。然而，在拉丁美洲，原住民族一如既往，仍被边缘化，原住民与国家性及非国家性的行动力量之间，常常爆发矛盾。虽然许多原住民团体针对物质贫困以及社会歧视举行抗议活动，然而，在原住民身份意识框架下开展的政治参与活动，并不可称之为深入；一方面存在着各种弊病，而另一方面国际关注力度加大，这有理由让人估计可以出现强而有力的政治参与活动，然而实际并非如此。社会运动研究方面的认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人们的估计与现实之间存在着落差。

集体政治参与活动的前提条件是，一个社会团体感受到自己是这样的一个团体。以原住民身份为基础而出发的政治参与活动，与其他以民族认同为基础的政治参与活动一样，并不是自动从人们臆造出来的某些生物或者文化共性发展而来的。人们无法对原住民性这个词做出清晰定义。它并不是“自然的”、集体性质的团体归属标志，而首先是在殖民化过程中，由欧洲人人为设计才产生的。这一概念从管理角度出发，将原本极具差异性的人口概括成一个整体。今天，来自近600个不同民族的约五千万原住民生活在拉丁美洲。例如玻利维亚有36个不同的、获得认可的原住民族，而委内瑞拉则认可51个不同的原住民族，伦比亚甚至认可了86个不同的原住民族。然而，无论是单个原住民族的规模大小，还是民族之间的界定，都没有清晰的定义。因此，原住民性这个词的存在，首先是要以此将原住民同白人、梅斯蒂索人区分开来，¹ 然而即使如此这儿的界限仍是模糊的。

图表1显示了拉丁美洲人口多样性。但是人们是依据颇具争议性的数据估计，计算得出原住民的数目，其原因是民族个体的身份认同，极其具有主观性。例如，2001年玻利维亚的人口普查中，百分之六十二的人自称是原住民，然而到了2012年，只有百分之四十一的人自称是原住民。原住民在一个国家占有的比例越

大，该国原住民在政治上获得的倾听，本应更多。原住民机构对玻利维亚及其他国家人口普查的方法提出质疑。例如人们在阿根廷讨论，到底有多少阿根廷人由于害怕受到歧视，而不敢公开宣称自己是原住民；据称，原住民所占的比例，实际上高于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数据。

因此，人们预先给定的团体归属感，并不能自动导致原住民政治参与活动诞生，原住民政治参与活动的形成，是多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前提是，被定义为原住民的人群受类似问题的折磨（例如贫困或歧视）。此外，资源的供给、特有的历史经验、对手与同盟的存在，都起到重要作用。下文将举例显示，这些因素如何在下列各项起到作用：原住民族是否自发组织政治参与活动；他们的抗议活动是否获得支持；虽然开端颇具成功希望，然而他们是否很快就失去了战斗力。

目前矛盾

虽然人们对原住民性无法进行明确定义，然而拉丁美洲种族上的归属感以及社会经济状况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无论人们进行分类时，是否按照肤色、母语、农村地区的出生背景，抑或按照自我定义：一般来说，无论是收入、教育程度、食物、健康，抑或是预期寿命，原住民族的境遇，各方面都比非原住民差。² 过去这些年里，不同的原住民群体加大了反对国家性及非国家性的行动力量的政治参与活动力度，以此阻止自身境遇每况境下的危险。其中，资源开采（特别是矿业）、基础设施项目（街道建设以及电力）方面的矛盾，都起到极其重要的影响。

土地及资源占有越来越集中化，国际康采恩经常大肆收购。将森林夷为平地、引入单一种植模式以及其他措施，都给环境以及饮用水、地下水污染方面带来了严峻后果。目前拉丁美洲最受争议的矿山项目中的一项，就是秘鲁西北部地区计划在建的孔加铜矿和金矿项目。其建设过程中要求将四座山中湖泊排干，然而这将威胁地方饮用水供应问题。该矿山项目引发的矛盾中，2012年有五人死亡，五十人受伤。一年多以来，居民们在山里的湖边

1 梅斯蒂索人，由欧洲人与原住民祖先混血而成。

2 详细信息参见IWGIA 2013。

图表1：拉丁美洲原住民所占比例的官方估计

国家	原住民族成员人数	整个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	民族/语言数量
阿根廷	600329	1,6	超过18个民族
玻利维亚	2811011	41	36个民族
巴西	817000	0,42	约200个民族，其中包括与世隔绝的67个民族
智利	1369563	8	9个民族
哥斯达黎加	104143	2,42	8个民族
厄瓜多尔	830418	6,8	14个民族
萨尔瓦多	11500	1,5	4个民族
危地马拉	6000000	60	24个民族
洪都拉斯	520000	11,2	7个民族
哥伦比亚	1378884	3,4	87个民族，65种语言
墨西哥	15703474	14,9	62种语言
尼加拉瓜	440000	6,1	7个民族
巴拿马	417559	12,7	7个民族
巴拉圭	108803	2	20个民族
秘鲁	9000000-13200000	31-45	超过51个民族
乌拉圭	115118	3,5	(未统计)
委内瑞拉	725128	2,2	51个民族

来源：根据IWGIA (2011, 2013)以及各国人口普查数据，作者本人整理。

扎营露宿，保护湖泊，然而政府部门宣布这是紧急状况，加强派驻警察，这样就阻止了抗议活动扩大化。在阿根廷、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委内瑞拉，原住民团体也在2012、2013年对矿山项目、石油钻探、粗放型农业提出抗议，其中亦有人受伤。

基础设施项目，例如在原住民族地区修建高速公路、发电厂，则引发其他矛盾，其原因是修建这类项目，让土地变得无法耕作，让当地无法推行旅游业。这类项目引发的后果，还包括环境问题及洪水暴发。引起国际关注的抗议活动中，就有反对巴西贝罗蒙特大坝的抗议活动（参见：Peters 2011），另一出名的抗议活动就是反对修建穿过玻利维亚伊西博罗原住民保护地国家公园（Territorio Indígena y Parque Nacional Isiboro Securé）的高速铁路（参见：Garzón 及 Schilling-Vacaflor 2012）。此外，墨西哥瓦哈卡州的哈瓦人及萨波特科克人，于2012年抗议人们将风能装置扩张到特万特佩克地狭；哥斯达黎加的特瑞波族及布伦卡族，则抗

议修建埃尔迪奎斯坝。这些抗议活动都同样得到升级。

政治参与活动的形式

除了请愿、法庭程序、议会表决等机构制度化的政治抗议活动以外，原住民团体也常常使用非制度化的形式，进行抗议，他们尤其采取示威游行及罢工的方式，也进行绝食抗议、封锁街道（部分情况下暴力封锁）、占领房屋。2012年4月，在玻利维亚的伊西博罗原住民保护地国家公园，活动分子徒步示威，从贝尼市出发，跋涉到距离620公里以外的首都拉巴斯，要求政府改弦易辙。在厄瓜多尔，原住民组织亦徒步示威，跋涉到距离700公里外的首都基多，对一项跨国矿山项目提出抗议。2010年以来，阿根廷的库姆人组成的团体用占领、封锁及绝食抗议的方式，抗议人们掠夺土地。

原住民团体进行政治参与活动，常常由特殊地方问题所引发，正如阿根廷发生的事件所显示的那样。但是，许多抗议活动也由地方性或者全国性组织实施，这些组织将自己看作原住民族的利益代表者。因为多个民族的机构聚集到一起，作为原住民族而行动，而不是作为地方农民或者劳工而行动，也不是作为诸如艾马拉人或萨波特科克人这类特殊的民族而行动，因此人们或可将其称之为一种泛原住民的政治参与活动。在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全国性的原住民机构特别强大，而在巴西、哥伦比亚或者巴拿马这些原住民族人口较少的国家里，也能找到全国性的原住民机构。危地马拉以及秘鲁这些国家里生活着重要的原住民族，这些国家的原住民机构反而仅在地方或者区域层面开展活动（参见：Van Cott 2005; Pallister 2013）。

几个国家里，也诞生了原住民组织出生的政治家及政党，例如在玻利维亚诞生了社会主义行动运动（Movimiento al Socialismo），在厄瓜多尔诞生了多国历史转折点统一运动（Movimiento de Unidad Plurinacional Pachakutik）。即使在那些原住民人口相对较少的国家里，政党也得以成功立足，例如哥伦比亚的社会独立联盟（Alianza Social Independiente，前身为原住民社会联盟），抑或尼加拉瓜的“大地母亲之子”（YATAMA）。与之相反，在危地马拉以及秘鲁，只有零星几位原住民议员，列席于地方性或者全国性的政治委员会。虽然那里原住民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颇大，目前为止，那里还没能诞生成功的原住民政党（参见：Pallister 2013; Raymond 及 Arce 2013）。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拉丁美洲的原住民组织也加大了在国际政治中的活动，并取得了绝对显著的成功。例如，这些组织参加联合国组织的两次“世界原住民族国际十年”（1995年至-2004年，以及2005年至2014年），并且2007年参与到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的拟定工作中来。这些组织在联合国的气候保护及生态多样性方面的谈判中极其活跃。在此，国际社会也认为他们是尤其受到影响的民族群体。这一认可，尤其涉及到土地权利方面，这可以让他们在国家层面获得更大的政治认可（参见：Betzold 及 Flesken 2014）。

虽然这些例子显示，许多原住民群体在整个拉丁美洲组织起来，以代表其自身利益，但是这类活动的规模极不符合其在

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不合乎已存的不均衡性问题。国际社会在过去数十年里对原住民性这一主题加大了关注力度，西方的非政府组织（NRO）支持原住民的愿望及其政治参与活动，如果人们考虑到这两点，更加会对此现象感到吃惊。此外，新诞生的组织原本可以从邻国的成功运动中汲取经验，然而它们却未能做到这一点。资源不足、特殊的历史经验、敌对力量的存在、缺少同盟，以及原住民组织内部的利益之争，这都导致此处提及的现实与预期之间存在着落差。

资源匮乏

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里，原住民社会及经济方面被边缘化。由于原住民常常缺乏必需的经济及人力资源，从而无法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有效地代表其利益。因此他们采用自发抗议游行及静坐封锁的方式，在重要的政治委员会里进行持续院外游说活动，这种方式实行起来会更加容易。这些活动之所以常常仍是地方性抗议活动，其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缺少法律方面的知识——同样也是因为国家自身没有提供足够信息。

此外拉丁美洲的国家人口分布相对稀疏。平均一平方公里上生活的人数，不到30人（此处可以比较一下：德国一平方公里约为230人）。原住民尤其生活在偏僻的、通常是交通不便的农村地区，例如亚马逊地区；这让人难以成立跨地方性的组织。同样，语言障碍也起到隔离作用。例如在哥伦比亚有65种不同语言，墨西哥有68种不同语言（表格1）。媒体在消除这种不平衡性弊端方面，作为甚少。报纸、电台及电视节目极少对此进行报道，如果报道，常常也是对相关事件进行肤浅并（或者）不公正的报道。此外，媒体几乎只代表传统精英阶层，以及私人企业家、保守政客的利益（参见：Kitzberger 2013）。

但是，伴随着越来越多的数字化以及文字扫盲教育，获取信息以及进行交流的可能性得以改善。如今，原住民活动分子越来越多使用互联网上的社交网络。2013年6月，特里萨行动分子通过脸书，向巴西的全国性媒体通告巴西警察杀害了一名特里萨成员，其中也包括向巴西政府通知了这一事件。<www.servindi.org>这一网址

作为“另类通讯社”，就整个拉丁美洲原住民主题进行报道。

但是，即使资源匮乏，让政治参与活动变得艰难，这并不是组织薄弱、政治参与活动薄弱方面的决定性原因。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一因素与其他阻碍性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独特历史经验

危地马拉以及秘鲁两国，原住民所占的比例相对而言颇高，但是这两个国家里泛原住民的政治参与活动极其薄弱，尤其是与玻利维亚或者厄瓜多尔进行比较，这两国颇有不足。在危地马拉以及秘鲁这两个国家里，政治参与活动程度低，其原因尤其在于其独特的历史经验、国家对原住民的压制。因为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原住民组织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得以诞生并获得发展，然而秘鲁和危地马拉这两个国家，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都还笼罩在内战的阴影之下。直到今日，这些内战仍对社会发展起到影响。受毛泽东主义影响的秘鲁游击队——“闪光之路”（Sendero Luminoso）与秘鲁政府爆发了冲突，冲突中超过69000名秘鲁人死亡。在危地马拉，游击队以及国家安全力量长达36年的内战过程里，有超过200000人死亡或失踪。这两个国家里，大部分的牺牲者是原住民；许多人逃往城市里，或者甚至逃往国外。这削弱了已有的社会结构，而这种社会结构原本能够成为政治参与活动的基础。此外，人们也用物理暴力形式阻止这类活动，因为政治参与活动，不仅被叛乱组织、也为国家安全力量视作是敌意活动（参见：Van Cott 2005; Pallister 2013）。

因此，与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相比，危地马拉以及秘鲁的原住民利益群体的发展，起步较晚。即使这两个国家里，人们加大尝试建立全国性机构的力度，但是许多机构扎根于地方，无法超越其地方层面。这种分裂性阻止了泛原住民运动的形成，这样也阻止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原住民集体精神的形成。例如，来自危地马拉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Rigoberta Menchú，是玛雅族原住民的一员，而她2007年及2011年参加总统大选时，仅获得百分之三的选票。

秘鲁也同样没有成功的原住民党派。原住民对自身的利益有着不同的看法，因

而秘鲁人民无意让原住民直接代表其利益。虽然原住民机构最先成功地将原住民利益纳入政治议事日程，但是现在其他一些规模更大的政党也考虑到原住民利益问题。过去这些年里，秘鲁的政治家从邻国学习其发展经验，加强对秘鲁原住民愿望的讨论；这样，他们先发制人，而原住民组织变得无计可施（参见：Raymond 及 Arce 2013）。

同盟及对手

除了缺乏资源、缺乏组织政治参与活动的机会以外，同盟及反对力量也在政治参与活动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在拉丁美洲，天主教会常常促使原住民的组织工作变得更加容易，众多非政府组织也发挥了这类作用，国际组织也益发从事这方面工作，例如联合国设立了原住民特使。

与之相反，原住民组织的对手常常是经济利益的代表以及政府。他们不仅追寻背道而驰的目标，不仅无意组织原住民，而且也积极尝试对此加以阻碍。因此，即使玻利维亚的总统Evo Morales宣称支持原住民，2013年12月他还是将丹麦发展援助组织IBIS（名称意为“朱鹭”）驱逐出境，其理由是该组织“过分干预内政”。人们没有进一步说明指控丹麦组织IBIS的原因，但是人们似乎以此惩罚该组织在原住民组织与政府出现冲突时，对原住民组织提供了支持。

智利就是一个极其突出的例子，自2002年起，该国多次针对马普切人行动分子，实施反恐怖主义法，最近一次是2013年（参见：Richards 2010; IWGIA 2013）。虽然在与马普切人的矛盾中，土地权之争常常引发暴力行动，例如占领土地、纵火、谋杀。然而人们能用已有的刑法来制裁这类犯罪行为，无需动用反恐怖主义法。即使是国际法也都不会将占领土地、纵火这类罪行，理解成恐怖主义行为。但是在反恐怖主义法的基础上，人们可以采取未获常规刑法程序允许的措施：嫌疑分子可以在不受控告的情况下被拘留，拘留时间不受限制，甚至不用公布证人的身份、调查以及审理进程。此外，该法律在预防恐怖主义行动措施中，赋予警察合法使用国家暴力的权利，并将马普切人中的抗议分子一概视为嫌疑犯。人权观测组织早在2004年就批评，认为使用反恐

怖主义法为过分之举；那时就有多项官司由于缺乏证据而终止。这样，政治参与活动就变得艰难起来。

利益矛盾

为了能够展开政治参与活动，相关各方必须对外代表其共同利益。虽然外界常常将原住民族视作一个相同利益共同体，但是他们看来面临各种各样共同的问题，但是他们常常对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和其他团体一样，他们对政治策略也持不同意见。不仅各原住民族之间，而且在原住民同一群体内部，也都存在着这些差异，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于：所处的不同地理位置、相应的地方性问题及矛盾、对整个社会或国家的融入度等等。意见分歧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对于发展这一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一些原住民团体遵循以增长为中心的西方发展理念，另一些团体则相信所谓的“美好生活”（即所谓的*buen vivir* 或者*sumak kawsay*），这种生活更重视发展中的社会及自然环境兼容性。

例如，上文已经提及的玻利维亚伊西博罗原住民保护地国家公园矛盾，来自低地地区的组织尤其进行论证，要保护环境，反对修建公路。然而来自高地地区的组织，则赞成修建公路，他们认为，这能支持经济发展，并与政府保持一致立场。在这类内部矛盾发展过程中，人们不免常常讨论，谁是“真正的原住民”。玻利维亚本国以及国际社会都欢呼Morales总统作为第一位原住民总统上台，然而一些活动分子称他“并非是原住民，而是社会主义者”，或者甚至称他为“原住民运动的敌人”（参见：Albro 2010：第416页）。这类分歧会削弱跨地区性原住民运动的产生或扩大。

原住民团体组织没有实现跨地区运动，而是组成集中关注某一问题的地方利益共同体，或者组成与职业相关的利益共同体。其他的行动力量，例如左翼党派或者教会组织，关心社会经济不平衡性问题，这些其它的行动力量代表利益时，不是根据集体原住民身份意识，而是根据其他的社会身份意识组织起来的。然而，原住民及左翼组织、政党之间的利益交集是有限的，正如玻利维亚与厄瓜多尔的全国性原住民机构经验所显示的那样。二十一世纪初，原住民组织以及左翼组织在与新

自由主义政府出现争论时，这两类组织还同心协力，然而Evo Morales在玻利维亚政府选举获胜后，以及Rafael Correa在厄瓜多尔获胜后，各成立具有左翼倾向的政府组织，然后原住民组织就与这些来自工会及劳工党派的前任同盟之间出现争执（参见：Van Cott 2009）。

公民权以及参与

不同因素的交互作用，阐释了拉丁美洲原住民政治参与活动不均衡发展的原因。如果人们清楚认识到原住民族的多样性，那么原住民政治参与活动发展不平衡，就不会那么让人感到吃惊。无论如何定义原住民政治参与活动，原住民政治参与活动的主要原因，看来是社会经济条件不平衡。2014年9月的联合国世界原住民大会结束时发表的文件里，人们对原材料开采以及自决权这些主题，甚至只是稍加提及，或者是完全缄口不提。

消除不平衡，首要的是：政府要遵守代表制民主的准则，而政府自己也声称感到有责任要遵守这些准则；此外政府要在本国的所有地方、向所有社会团体保障代表制民主的准则。其原因是，尤其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拉丁美洲的许多政府承认了原住民的权利，然而，却很少将此付诸实践。与此相反，原住民团体尝试参与的活动，继续受到忽视，甚至被压制。如果能开放已有的政治结构，就可以让人民中被边缘化的部分人获得更有效的机会，来代表自身的利益；开放已有的政治结构，也能够减少社会潜在矛盾。

而且，为了专门实现原住民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领域的参与，务须消弭其他具有边缘化作用的因素，例如历史进程的影响。对原住民公民及种族提供予以特别照顾的“积极歧视”，就可以实现这一点。只有这样，才能够开始平等对话，人民中的各个部分才能在同样程度上使用政治角逐场地。

最后，政府必须承认，原住民极具差异性。如果人们能在引进或者加强原住民直接民主机构，并同时将其纳入到代表制民主机构中来，那么，这也会促使原住民中的少数民族获得倾听。如果人们能创造这些基本条件，那么原住民权利才能完全得以实现，而这正也是联合国世界大会的主要目标。

参考文献

- Albro, Robert (2010), Bolivia's "Evo Phenomenon": From Identity to What? (玻利维亚的“Evo总统现象”:从身份意识走向何方?),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Anthropology*, 11, 2, 408–428.
- Betzold, Carola, 及 Anaïd Flesken (2014), Indigenous Peoples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Negotiations: Evidence from Climate Change and Biodiversity (原住民族以及国际环境谈判:气候变化及生物多样性方面的证据), Thoko Kaime (编辑), *Cultural Legitimacy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on Climate Change*, Abingdon: Routledge, 63–83.
- Garzón, Jorge, 及 Almut Schilling-Vacafior (2012), *Infrastrukturprojekte zwischen geopolitischen Interessen und lokalen Konflikten* (地缘政治利益及地方冲突之间的基础设施项目), *GIGA Focus Lateinamerika*, 10, 网址: <www.giga-hamburg.de/en/system/files/publications/gf_lateinamerika_1210.pdf> (2014年3月14日查阅).
- Human Rights Watch (2004), *Undue Process: Terrorism Trials, Military Courts, and the Mapuche in Southern Chile* (过分的处事方法:智利南部的恐怖主义审判、军事法庭以及马普切人), 网址: <www.hrw.org/reports/2004/10/26/undue-process> (2014年3月28日查阅).
- International Work Group for Indigenous Affairs (IWGIA) (2013), *The Indigenous World 2013* (2013年的原住民世界), Copenhagen.
- International Work Group for Indigenous Affairs (IWGIA) (2011), *The Indigenous World 2011* (2011年的原住民世界), Copenhagen.
- Kitzberger, Philip (2013), *Medien in Lateinamerika: Zeit für Reformen* (拉丁美洲的媒体:到了改革的时间), *GIGA Focus Lateinamerika*, 6, 网址: <www.giga-hamburg.de/en/system/files/publications/gf_lateinamerika_1306.pdf> (2014年3月14日查阅).
- Pallister, Kevin (2013), Why No Mayan Party? Indigenous Movements and National Politics in Guatemala (为何没有玛雅族党派?危地马拉的原住民运动以及国家政策),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55, 3, 117–138.
- Peters, Ina (2011), *Der Belo Monte Staudamm: Paradebeispiel für eine erfolgreiche Zivilgesellschaft in Brasilien?* (贝罗蒙特大坝:巴西成功公民社会的典型例子?), *GIGA Focus Lateinamerika*, 9, 网址: <www.giga-hamburg.de/en/system/files/publications/gf_lateinamerika_1109.pdf> (2014年3月14日查阅).
- Raymond, Christoph, 及 Moisés Arce (2013), The Politicization of Indigenous Identities in Peru (秘鲁原住民身份意识的政治化), *Party Politics*, 19, 4, 555–576.
- Richards, Patricia (2010), Of Indians and Terrorists: How the State and Local Elites Construct the Mapuche in Neoliberal Multicultural Chile (关于印第安人以及恐怖分子:国家以及地方精英如何在新自由主义多元文化的智利构建马普切人),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42, 59–90.
- Van Cott, Donna Lee (2009), Indigenous Movements Lose Momentum (原住民运动失去动力), *Current History*, 2, 83–89.
- Van Cott, Donna Lee (2005), *From Movements to Parties in Latin America: The Evolution of Ethnic Politics* (拉丁美洲由运动到政党:种族政治的发展),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作者简介

Anaïd Flesken博士，是GIGA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拉丁美洲领域的科研人员。她研究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地区诸国的政治进程与种族政治参与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自2014年4月起，她获得了蒂森基金会博士后奖学金资助。她是GIGA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一号科研重点“政治体系合法性及效率”以及二号科研重点“暴力与安全”的成员。

邮件地址: <anaid.flesken@giga-hamburg.de>, 网址: <www.giga-hamburg.de/en/team/flesken>

■ 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中，本专题的相关研究

GIGA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的一号科研重点“政治体系合法性及效率”以及二号科研重点“暴力与安全”，研究种族关系，尤其是原住民族问题。获得第三方资金资助的两个科研项目，负责研究拉丁美洲的资源分配及矛盾问题。

■ 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中，本专题的相关出版物

Barrera Vivero, Anna (2012), *Promoting Change in Legally Plural Settings: Domestic Violence and Indigenous Women's Quest for Justice in the Andes* (多元法律框架下推动变化: 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地区诸国的国内暴力以及原住民女性谋求公正), Hamburg: Universität Hamburg/GIGA.

Flesken, Anaïd (2014), On the Link Between Ethnic Politics and Identification: Lessons from Bolivia (种族政策及身份意识之间的链接: 从玻利维亚汲取的教训), *Ethnopolitics*, 13, 2, 159–180.

Flesken, Anaïd (2013), *Ethnicity Without Group: Dynamics of Indigeneity in Bolivia* (无团体的种族性: 玻利维亚的原住民动态发展),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19, 3, 333–3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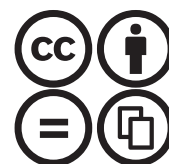
Schilling-Vacaflor, Almut, 及Anna Barrera (2011), *Lateinamerikas neue Verfassungen: Triebfedern für direkte Demokratie und soziale Rechte?* (拉丁美洲的新宪法: 直接民主与社会权力的推动力?), GIGA Focus Lateinamerika, 2, 网址: <www.giga-hamburg.de/en/publications/giga-focus/lateinamerika>.

Schilling-Vacaflor, Almut, 及 René Kuppe (2012), *Plurinational Constitutionalism: A New Era of Indigenous-State Relations?* (多民族的宪政: 原住民与国家关系的新纪元?), Detlef Nolte 及 Almut Schilling-Vacaflor (编辑), *New Constitutionalism in Latin America: Promises and Practices*, Aldershot: Ashgate, 347–370.

Seemann, Miriam (2009), *Kampf gegen internationale Bergbaufirmen. Ecuador: Indigener Protest im Amazonas* (反对国际矿业公司的战斗。厄瓜多尔: 亚马逊原住民的抗议活动), *Wissenschaft und Frieden*, 2, 网址: <http://wissenschaft-und-frieden.de/seite.php?artikelID=1535>.



GIGA《焦点》刊物，为开放式发表刊物。您可以在网上免费阅读、下载，链接为 <www.giga-hamburg.de/giga-focus>，并可依据“知识共享许可协议”中“姓名标示—禁止改作3.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d/3.0/de/deed.en>的规定，自由复制、传播、展示作品。特别注意：正确注明该文首次发表于GIGA《焦点》刊物，不得更改、删节。



GIGA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 Leibniz-Institut für Globale und Regionale Studien (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 – 莱布尼茨全球与区域研究所) 坐落于汉堡，是一家政治上独立的、非大学性的研究机构，就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中东、全球问题，出版《焦点》系列刊物。编辑组讨论、甄选文章，文章的中、英文版发表于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焦点》刊物国际版。该系列刊物由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编辑、出版，非德国外交部刊物。选取的主题、作者所持的观点，并不代表德国联邦政府的官方立场。保留错误、遗漏的可能性。GIGA及其作者，对内容正确性、完整性，或使用本刊物提供信息而造成的后果，不承担责任。不使用女性专有人称、职位表达方式的原因，仅是为了方便阅读。

编辑: Robert Kappel; 杂志系列总负责: Hanspeter Mattes

翻译: 曹娟 (Cao Juan); 审校及排版: Christine Berg (山可婷)

联络: <giga-focus@giga-hamburg.de>; GIGA, Neuer Jungfernstieg 21, 20354 Hamburg, Germany 德国汉堡

出版说明

GIGA Focus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Leibniz-Institut für Globale und Regionale Studien